IRJEMS《国际经济与管理研究期刊》由 Eterna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出版，ISSN：2583 – 5238 / 第2卷第1期，2023年3月 / 页码：283-290 论文编号：IRJEMS-V2I1P136，DOI：10. 56472/25835238/IRJEMS-V2I1P136

原创文章疫情期间葡萄牙家庭储蓄：抵御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的一种更好方式?

[1]Ana Lúcia Luís，[2]Natália Teixeira，[3]**Rui Braz**[1]葡萄牙 Instituto Superior de Gestão。[2]葡萄牙 Instituto Superior de Gestão、CEFAGE。[3] 葡萄牙 Instituto Português de Administração de Marketing。

收稿日期：2023年3月9日　　修订日期：2023年3月19日　　录用日期：2023年3月29日

摘要：2020年3月的封控使葡萄牙储蓄飙升至历史高位，在2021年初达到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13.4%（INE，2023）。若要找到相近的储蓄数据，我们得追溯到1999年。由于消费降至最低限度，葡萄牙人不得不储蓄。家庭减少支出，更多是因为缺乏消费的替代选择，而非其他原因。消费、储蓄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思想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 [（凯恩斯，1936；1937）；（弗里德曼，1957）]。传统上，高储蓄水平被认为有利于经济，因为它能增强融资能力（Singh，2010）。然而，这里的影响可能是双重的。一方面，葡萄牙似乎遭遇了所谓的节俭悖论（凯恩斯，1936）。如果消费者决定将相当一部分收入用于储蓄，那么对已生产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需求下降会导致供给、生产和收入减少，并且矛盾的是，储蓄也会减少。另一方面，在疫情高峰期积累储蓄之后，葡萄牙人如今正动用这些储蓄进行延后消费，并希望借此更好地抵御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

本研究旨在考察疫情最严峻时期（2020年3月至2022年4月）葡萄牙家庭的储蓄变化。研究方法分析了储蓄、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各组成部分的分解，并得出结论：这些突然形成的被迫储蓄并不符合传统的储蓄经济理论。

关键词：消费、储蓄、疫情、通货膨胀。

一、引言

古典经济理论历来认为，储蓄通过与投资的关系，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储蓄与投资之间被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其依据是，若要为资本要素的增长提供投资资金，就必须放弃消费，并将资金投入市场。多项研究记录了这种关系，表明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储蓄决定一个国家为投资目的筹措资金的能力，而投资将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和增长率[(Feldstein和Horioka，1980)；(Baxter和Crucini，1993)；(Attanasio等，2000)；(Holmes，2005)]。在经济衰退时期，储蓄也尤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各国更好地应对危机造成的损害。从这一角度看，储蓄被视为通过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意义重大。尽管储蓄被认为对各国经济至关重要，但随着经济对外开放，人们却忽视了对家庭储蓄及其对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的探讨。受全球化影响，融资和投资来源日益多样化，并扩展至国内市场之外，使私人储蓄退居次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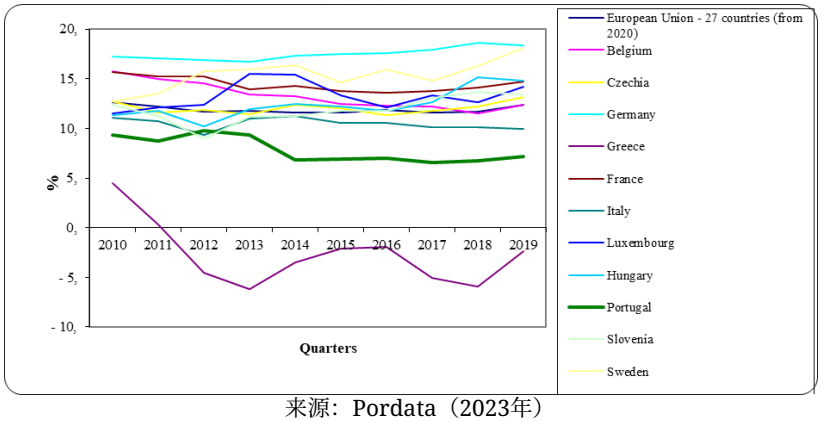
一国经济中的储蓄函数由众多经济、社会、人口和文化因素决定。确定这些因素对于正确制定旨在刺激家庭储蓄的政策至关重要。储蓄、利率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生产性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由来已久，关于这种关系如何形成也存在不同观点[（凯恩斯，1936年）；（卡莱茨基，1971年）；（斯密，1776年）]。Niculescu-Aron和Mihăescu（2012年）指出了人口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并强调，在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和家庭行为参数制定刺激家庭储蓄的措施时，经济发展水平应作为一项基本参数。在较发达的经济体中，面对全经济范围的不确定性，总储蓄会增加；尤其当不确定性影响劳动收入时，储蓄率将继续维持，甚至可能上升，从而使经济复苏进程更加复杂[（Cox等人，2020年）；（Levenko，2020年）；（Bayer，2019年）；（Mody等人，2012年）]。

Mody等人（2012年）验证了预防性储蓄模型适用于经济危机时期和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形，尤其是不确定性涉及劳动收入时；储蓄率上升会导致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无论家庭储蓄行为源于个人动机（家庭特征），还是现有的流动性约束（制度性宏观经济变量），都有证据表明，家庭的储蓄偏好以及不同储蓄动机的相对重要性具有一定的同质性（Le Blanc等人，2014年）。在此类情形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时，金融危机往往会推高储蓄率，导致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收缩。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预防性储蓄这一概念，源于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劳动收入不确定性加剧，进而导致家庭储蓄增加[（Mody等人，2012年）；（Steindl，1990年）]。

在COVID-19疫情期间，欧洲家庭的储蓄率达到历史高位，可能的原因有多种：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引发的预防性动机、封控措施导致消费减少，以及公共债务增加使家庭很快可能面临税负上升（Gropp与McShane，2021）。Gersovitz（1988）从决策者在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进行选择的角度评估了储蓄。因此可以认为，在经济不确定时期，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期间，储蓄往往会增加。COVID-19疫情引发了这场危机，因此有必要检验节俭悖论是否成立。凯恩斯（1936）指出，家庭储蓄倾向上升的总体影响会导致经济产出下降，进一步加剧衰退效应。面对经济衰退，个人和家庭推迟消费与支出是很自然的，但也很容易预见，集体支出的减少将通过消费导致总产出下降。Al-Wakil（2020）认为，集体恐惧以及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会助长经济衰退。然而，COVID-19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具有其特殊性：储蓄增加是由于经济活动被迫停止，而非出于对失业的恐惧，而是因为无法消费（Al-Wakil，2020）。

葡萄牙传统上储蓄率偏低，这一事实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尽管人们承认这一问题，却很少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因此，疫情及封控措施导致葡萄牙储蓄率近期突然升至历史高位，这一变化值得特别关注。葡萄牙储蓄率偏低可能由多种因素造成。无论这是葡萄牙金融发展模式、社会保障分配制度的直接结果，还是经济文献中通常提及的变量所致，例如经济增长、失业率、人口趋势、利率或通货膨胀水平，可以肯定的是，葡萄牙的储蓄数据一直系统性地低于欧盟大多数国家。

图1——疫情前储蓄



来源：Pordata（2023年）

图1展示了部分欧洲国家，这些国家的储蓄率均高于葡萄牙。过去十年，葡萄牙处于弱势地位，这一点显而易见，其储蓄率明显低于欧盟27国的平均水平。只有希腊、立陶宛、塞浦路斯和波兰（后三国未在图中显示）的储蓄率低于葡萄牙。

A）储蓄与疫情危机 2020年和2021年，我们目睹了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疫情宏观经济学（Pires de Souza，2021年），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方面，公共卫生政策禁止消费和生产；另一方面，政府采取经济政策措施，以减轻经济活动停摆的影响，由此直接导致收入再分配。两者结合使家庭储蓄增加。疫情宏观经济学也是经济衰退的宏观经济学。然而，这并非经济学家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所研究的那种寻常经济衰退。面对

COVID-19等流行病，社会隔离是拯救生命的主要手段。隔离避免了商品和服务消费以及面对面工作中通常出现的聚集；这些活动被称为接触密集型活动。换言之，社会隔离要求减少消费和生产，因此导致经济衰退。因此，经济衰退发挥了公共卫生措施的作用（Baldwin和di Mauro，2020年）。

分析危机对储蓄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在经济衰退背景下，家庭储蓄的变化呈现出逆周期效应，葡萄牙经济也不例外。多项研究记录了不同国家的情况：尽管经济衰退，家庭储蓄仍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受到预防性动机的驱动[（Kim，2010年）；（Nahmias，2010年）]。

Adema 和 Pozzi（2015年）研究了1969—2012年间16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家庭储蓄，并指出，在经济衰退时期，家庭对劳动收入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从而促使预防性储蓄增加。在经济衰退时期，因果关系也常被置于相反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如果家庭储蓄普遍增加，就表明经济陷入了所谓的节俭悖论。这一概念由凯恩斯于1936年提出，指出如果所有经济主体同时试图增加储蓄，这种行为将通过消费导致总需求大幅下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最终使最初的储蓄努力收效甚微（Mota，2017年）。

关于COVID-19疫情期间家庭储蓄行为，已有多项研究。Cox 等人（2020年）发现，疫情初期所有家庭无论收入高低都削减了支出；高收入家庭削减的幅度大于低收入家庭，但差异较小。就复苏而言，差异则相当显著，低收入群体的支出恢复得快得多（Bachas 等人，2020年）。Vanlaer 等人（2020年）将欧洲的消费者信心与家庭储蓄行为联系起来，并确定了对消费者情绪影响最大的具体指标，尤其是对家庭财务状况的信心。Dossche 和 Zlatanos（2020年）指出，为应对COVID-19，欧元区家庭储蓄率在2020年上半年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大多数欧洲国家采取的遏制措施禁止家庭购买支出篮子中的很大一部分常规商品和服务，导致了被迫储蓄；此外，疫情的突然暴发使未来失业风险急剧上升，从而促使家庭进行预防性储蓄，而这正是家庭储蓄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Dossche 和 Zlatanos，2020年）。

Brewer & Patrick（2021）分析指出，疫情期间支出总体下降，主要是由于休闲活动、外出就餐、假期和通勤成本减少（储蓄相应增加）；但这并不能代表所有家庭的经历。他们强调，必须恰当地理解不同家庭的差异化经历，以及这些差异对不同收入家庭生活水平造成的不平等影响。Martin 等人（2020）建立了一个微观经济模型，用于估算偏远程度对家庭收入、储蓄、消费和贫困水平的直接影响。该模型假设存在一个危机时期：部分家庭收入下降，并动用累积的储蓄满足消费需求；随后进入复苏时期，家庭试图将储蓄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在消费模式方面，这一时期的家庭消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最初出现急剧增长（尤其是零售和食品消费），随后整体支出大幅下降（Baker 等人，2020）。Andersen 等人（2022）指出，封控期间消费收缩是由暂时性的健康风险和产品采购限制所致；现有储蓄与持续的负面溢出效应关联甚微。另一方面，Basselier & Minne（2021）分析了 COVID-19危机后可能长期持续的储蓄行为，并发现这些超额储蓄中只有极少部分会重新用于消费。

II. 方法

通过开展文献综述，可以提出若干假设可以在葡萄牙的背景下提出并评估现实：

H1：在经济危机时期（如2008年金融危机和疫情危机），葡萄牙家庭的储蓄因不确定性和预防而有所增加。
H2：对经济运行，尤其是财务状况的信心，对储蓄有积极影响。
H3：新冠疫情期间储蓄的增加是由外生因素驱动的，并产生了持续的行为经济后果。

为评估并检验这些假设在葡萄牙情境下是否成立，我们对葡萄牙家庭储蓄率的变化进行了研究，重点关注新冠疫情及强制封控时期。同时，我们计算了葡萄牙储蓄水平、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并将国内生产总值拆分为不同组成部分，以评估上述假设是否属实，以及储蓄模式（尤其是在突然且出乎意料地被迫储蓄时）是否符合传统

储蓄经济理论。在分析期间，我们参考了多个来源收集统计数据，以研究葡萄牙家庭的储蓄行为，并将其与欧洲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比较。相关来源包括葡萄牙银行 (BdP)、国家统计局 (INE)、Pordata 和欧盟统计局。

III. 结果与讨论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001亿欧元，名义下降6.7%。2019年则增长了4.5%。这一结果表明，2020年是自1995年以来经济活动收缩幅度最大的一年（1995年是 INE 开始发布一系列国民账户数据的年份）。经济的可支配总收入（GDI）下降了5.5%，而上一年则录得4.4%的正增长。2020年，家庭（包括家庭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NPISHs））的名义可支配总收入达到1468亿欧元，较上一年下降0.7%；相比之下，2019年增长了4.6%。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大幅下降：2020年下降6.4%，而2019年曾增长4.1%。由于消费降幅远大于总可支配收入（GDI）的降幅，家庭储蓄大幅增加，增幅超过76.5%，相当于总可支配收入（GDI）的12.8%。2019年，储蓄率为7.2%（见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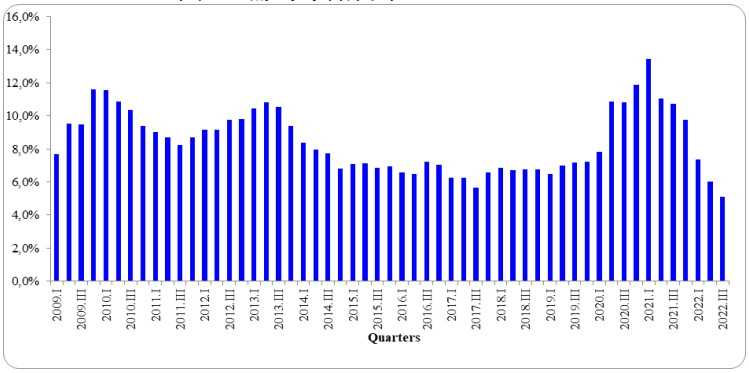
表1——葡萄牙经济年度指标　　201

			9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率）	5,1	4,7	4,5	-6,7	5,6
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变化率）	5,6	4,5	4,4	-5,5	6,7
家庭及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储蓄率（占总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	6,6	6,8	7,2	12,8	10,9
家庭 最终消费及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变化率）	3,7	4,2	4,1	-6,4	5,8
家庭及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可支配收入（变化率）	3,1	4,3	4,6	-0,7	4,0

来源：INE（2023年）

按季度细分数据可见，储蓄率（总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总额的百分比）从2020年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有所上升，由7.8%升至10.9%。从2020年到2021年，葡萄牙家庭继续储蓄。数据显示，储蓄率在2021年第一季度达到峰值，占可支配收入的13.4%；这一时期正值葡萄牙第二次封控。若要在葡萄牙找到如此高的数值，需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1999年第四季度，当时储蓄率为13.7%。2021年第一季度储蓄率上升，再次受到消费支出减少的影响；消费支出的下降抵消了可支配收入的小幅减少。

图2 – 葡萄牙储蓄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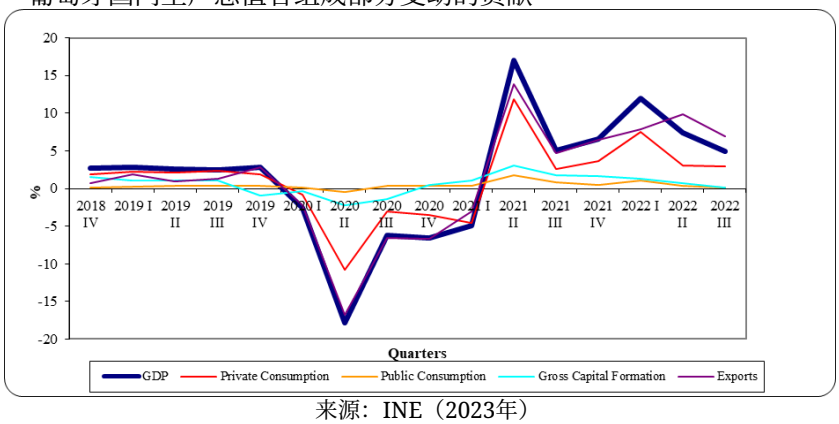


来源：INE（2023年）

尽管封控措施在葡萄牙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但根据 INE 的数据，可支配收入仍相对稳定。自2020年3月以来，政府在要求许多企业停业或缩减经营活动、数百万劳动者留在家中的同时，推出了多项收入支持和就业保留措施。简化停工是其中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使就业得以维持，也保住了相当一部分工资。失业率有所上升，但涨幅没有以往危机中那么惊人。信贷协议延期偿付让葡萄牙家庭得以减少住房支出。因此，随着可支配收入保持稳定，许多家庭只是调整了支出习惯。消费大幅下降，而原本用于咖啡馆、餐馆、交通、服装和鞋类、健身房及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几乎全都转化成了更多储蓄。

没有消费者会说自己完全没有受到疫情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因人而异。危机时期的一个典型现象是，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更有能力积累丰厚的储蓄缓冲。根据葡萄牙银行（2021年：11），“证据表明，2020年的储蓄积累更多集中在高收入家庭，这些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银行卡消费数据显示，2020年高消费人群削减支出的幅度大于低消费人群。”证据表明，无论是因裁员还是失业造成的收入损失，主要发生在工资较低、资历较少且签有不稳定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群体中。通常，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群体的储蓄能力也较低，因为日常开支占去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图3 – 葡萄牙国内生产总值各组成部分变动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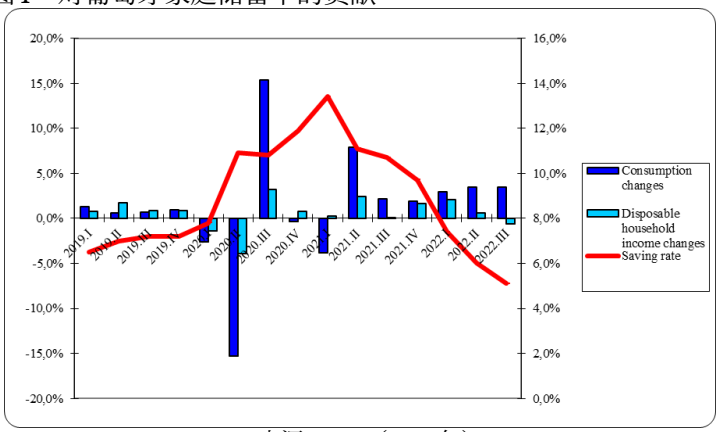


来源：INE（2023年）

注：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量，以百分点表示，并已根据日历和季节性影响进行调整。

按季度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后，可以清楚地看到，私人消费的权重确实如预期般显著。2019年，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的贡献从未超过2.3个百分点；而在2020年和2021年，消费与出口共同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的主要因素，这体现了消费限制的影响。因此，在葡萄牙首次封控期间（始于2020年3月，对应第二季度），消费变动为负，贡献了-10.8个百分点；出口则下降了16.8个百分点。再加上进口增加12.5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合计下降17.8个百分点，这是疫情危机期间葡萄牙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跌幅。2021年第一季度，即第二次封控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跌幅小得多，下降了4.9个百分点。消费减少了4.6个百分点，出口减少了3.1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的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有所增长，这对应着对经济实施的限制措施有所放宽。2021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7个百分点，其中私人消费贡献了11.9个百分点，出口贡献了13.8个百分点。

图4 – 对葡萄牙家庭储蓄率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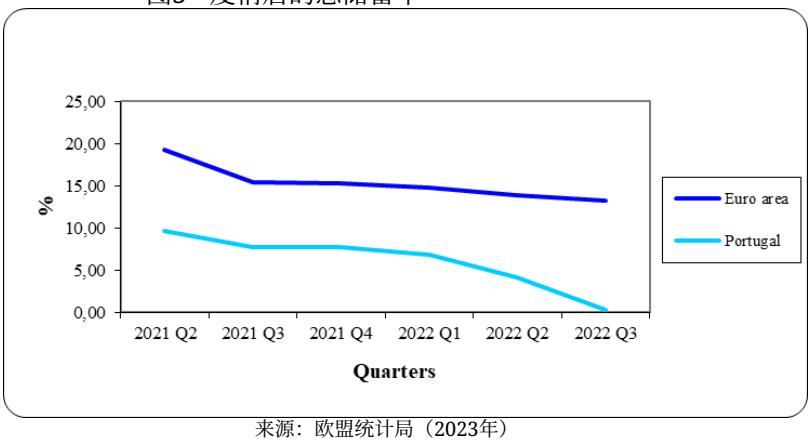
来源：INE（2023年）

2020年第一季度，也就是葡萄牙首次封控开始的时期，储蓄率占可支配收入的7.8%。由于封控始于3月中旬，这一数值尚未反映限制措施的实际影响。在下半年，封控已全面实施，储蓄率升至可支配收入的10.9%。这一结果源于私人支出的急剧下降：与上一季度相比，私人支出减少了15.3%，降幅超过了可支配收入3.9%的下降幅度。2020年第三季度，随着经济逐步解封，私人消费较上一季度增长了15.4%。可支配收入变动了3.2%，储蓄率为10.8%。2020年第四季度，葡萄牙的疫情形势恶化，但尚未实施新的封控措施；与上一季度相比，私人消费仅下降了0.3%，可支配收入则增长了3.2%。面对新一波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储蓄升至可支配收入的11.9%。

2021年第一季度，该国进入第二次封控。因此，家庭储蓄率再次上升，达到可支配收入的13.4%，鉴于葡萄牙传统上较低的储蓄水平，这是一个极高的数值。这一结果是由于最终消费支出较上一季度减少3.9%，超过了可支配收入仅0.2%的小幅增长。2021年第二季度，随着经济活动逐步恢复（尽管仍有一些限制），私人消费较上一季度再次增长7.9%，可支配收入增长2.4%，储蓄率为11.1%。随后，随着葡萄牙经济逐步解封，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在2022年前两个季度已回到疫情前水平，分别为可支配收入的7.4%和6%。储蓄模式的这一变化可归因于解封，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同时重新开放所导致的物价上涨。

正如预期和预测的那样，封控措施期间观察到的储蓄水平很快便消退了。2021年9月至2022年9月期间，葡萄牙家庭的储蓄率降至接近零。总储蓄率从2021年9月的7.75%降至2022年9月的0.24%。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2年第三季度，葡萄牙是欧元区国家中储蓄率最低的国家，欧元区储蓄率为13.2%。延后消费支出、利率上升以及通胀率不断攀升，是葡萄牙储蓄大幅下降的根本原因。2022年，葡萄牙的平均通胀率为7.8%，为1992年以来最高，这一数值无疑加速了储蓄率的侵蚀。葡萄牙银行（2021年）预测，储蓄率将在2021—2023年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这一预测并未实现；2022年储蓄率已大幅跌至历史低位。封控一度导致经济被迫关闭，之后经济重新开放；伴随而来的通胀危机源于全球供应链受阻和乌克兰战争，再加上葡萄牙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些因素都可以解释储蓄率的下降。

图5 - 疫情后的总储蓄率



来源：欧盟统计局（2023年）

本文提出的理论方法证明，将家庭可支配总收入（GDHI）、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c）和消费（C）作为解释储蓄（S）行为的因素是合理的，而储蓄行为是因变量。通过相关性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所有系数均为负，范围从以 GDHI 为自变量时相关系数的 -0.23，到以 C 为自变量时相关系数的 -0.62。因此，家庭可支配总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消费的下降会增强储蓄倾向。相关系数值印证了相关文献的观点，即不确定性和恐惧会促使人们出于预防性原因增加储蓄。

表2 - 相关性 可支配家庭总

收入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HI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0,96	
C	0,88	0,97
S	-0,23	-0,43

来源：作者的计算；INE（2023年）

介本研究进一步拓展 旨在以特定方式运用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所建立的因果关系
、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

IV. 结论

疫情期间葡萄牙家庭储蓄相关数据，并偶尔与欧洲平均水平及部分特定国家进行比较。理论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人们储蓄主要是出于预防目的，并为可能出现的未来困难做准备。对于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还需考虑一些额外因素：政府实施的经济封锁，以及因无处消费而产生的被迫储蓄。因此，预防性动机被“别无选择”的动机所取代。人们对储蓄必要性的经济认知（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打算在遥远的将来消费）也随之被取代。

关于提出的假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H1：在经济危机时期（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和疫情危机），葡萄牙家庭的储蓄因不确定性和预防需求而增加。尽管如此，我们仍须牢记，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具有独特特征：经济被迫关闭，严重限制了家庭的消费能力并影响其消费决策。

H2：对经济状况，尤其是财务状况的信心会对储蓄产生积极影响。无法验证。分析的数据表明，经济危机后储蓄有所减少，数值几乎为零，这与相关文献相矛盾。分析通胀上升对后疫情时期的影响十分重要，因为这可能会对本分析产生重大影响。未来分析中，若有相关统计数据可用，可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

H3：新冠疫情期间储蓄增加是由外生因素驱动的，并产生了持续的行为经济后果。该假设不成立。储蓄确实是由外生因素造成的，因为经济活动被强制关闭，储蓄也因此被“迫使”增加。然而，目前储蓄水平的数据处于历史低位，且几乎为零，因此预期中的行为变化不可能发生。

未来的研究可以按收入水平对储蓄进行细分分析，以确定家庭的储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

不存在与本文发表相关的利益冲突。"

V. 参考文献

[1] INE。https://www.ine.pt/xportal?xpid=INE&xpgid=ine_main（2023年）。

[2] 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国伦敦：麦克米伦（1936年）。[3] 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就业通论。”《经济学季刊》51.2（1937年）：209-223。[4] 弗里德曼，米尔顿。《消费函数理论》。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7年）。[5] 辛格，塔洛克。“国内储蓄会促进经济增长吗？来自印度的时间序列证据。”《政策建模杂志》32.2（2010年）：231-253。[6] 费尔德斯坦，马丁，和查尔斯·堀冈。“国内储蓄与国际资本流动。”《经济学杂志》90.358（1980年）：314-329。[7] 玛丽安·巴克斯特，和马里奥·J·克鲁奇尼。“解释储蓄—投资相关性。”《美国经济评论》（1993年）：416-436。[8] 奥拉齐奥·P·阿塔纳西奥、卢西奥·皮奇和安东内洛·E·斯科尔库。“储蓄、增长与投资：基于国家面板数据的宏观经济分析。”《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82.2（2000年）：182-211。[9] 马克·J·霍姆斯。“储蓄—投资相关性告诉了我们欠发达国家国际资本流动性方面的什么？”《经济一体化杂志》（2005年）：590-603。[10] 米哈乌·卡莱茨基。《资本主义经济动态精选论文集，1933—1970》。剑桥大学出版社档案（1971年）。[11] 亚当·斯密。《国富论》。英国牛津：麦克米伦。可查阅：http://www.bibliomania.com/2/1/65/112/（1776年）。[12] 伊莱娜·尼库列斯库-阿尤和康斯坦察·米哈埃斯库。“欧盟家庭储蓄的决定因素：哪些政策有助于增加储蓄？”《社会与行为科学程序汇刊》58（2012年）：483-492。[13] 娜塔莉·考克斯等。“疫情对消费者行为的初步影响：来自关联的收入、支出和储蓄数据的证据。”《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集》2020.2（2020年）：35-82。

[14] 娜塔莉娅·列文科。“感知到的不确定性是家庭储蓄的关键驱动因素。”《国际经济与金融评论》65（2020年）：126-145。[15] 克里斯蒂安·拜耳等。“预防性储蓄、非流动资产以及家庭收入风险冲击的总体后果。”《计量经济学》87.1（2019年）：255-290。[16] 阿肖卡·莫迪、Franziska Ohnsorge和达米亚诺·桑德里。“大衰退期间的预防性储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评论》60.1（2012年）：114-138。[17] Le Blanc, Julia等。“欧元区的家庭储蓄行为与信贷约束。”可见SSRN 2796993（2014年）。[18] Steindl, Josef。“家庭储蓄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PSL季刊评论》35.140（1982年）。[19] Reint Gropp和William McShane。《新冠衰退期间家庭为何储蓄如此之多？》。第1/2021号。IWH政策简报（2021年）。[20] Gersovitz, Mark。“储蓄与发展。”《发展经济学手册》第1卷（1988年）：381-424。[21] Al-Wakil, Hadi。“COVID-19与宏观经济悖论。”（2020年）。[22] PORDATA。https://www.pordata.pt/（2023年）。[23] PIRES DE SOUZA, FRANCISCO EDUARDO。“面包与马戏：论疫情的宏观经济学。”《巴西政治经济学杂志》/《政治经济学评论》41.2（2021年）：236-253。[24] Richard Baldwin和B. Weder Di Mauro。“缓解新冠危机：迅速行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VoxEU.org 18（2020年）。[25] Kim, Myeong Hwan。“美国个人储蓄的决定因素。”《应用商业研究杂志》26.5（2010年）：34-44。[26] Laurent Nahmias。“金融危机与法国家庭储蓄行为。”法国巴黎银行《经济形势》网站。http://economic-research. bnpparibas. com/Views/DisplayPublication. aspx（2010年）。[27] Yvonne Adema和Lorenzo Pozzi。“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与家庭储蓄：面板数据分析。”《欧洲经济评论》79（2015年）：214-233。[28] Paulo R. Mota。《扩张性紧缩——如何扼杀一个僵尸理念》。Leya（2017年）。[29] Natalie Bachas等。《疫情对消费者行为的初步影响：来自关联的收入、支出和储蓄数据的证据》。第w27617号。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20年）。[30] Willem Vanlaer、Samantha Bielen和Wim Marneffe。“消费者信心与家庭储蓄行为：跨国实证分析。”《社会指标研究》147（2020年）：677-721。[31] Maarten Dossche和Stylianos Zlatanos。“COVID-19与家庭储蓄增加：预防性储蓄还是被迫储蓄？”《经济公报专题》6（2020年）。[32] Mike Brewer和Ruth Patrick。“疫情压力。”Resolution Foundation简报，https://www.resolutionfoundation. org/publications/pandemic-pressures（2021年）。[33] Amory Martin等。“COVID-19对家庭消费和贫困的社会经济影响。”《灾害经济学与气候变化》4.3（2020年）：453-479。[34] Scott R. Baker等。“流行病期间家庭支出如何变化？2020年COVID-19疫情期间的消费。”《资产定价研究评论》10.4（2020年）：834-862。[35] Asger Lau Andersen等。“消费者对COVID-19危机的反应：来自银行账户交易数据的证据。”《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杂志》124.4（2022年）：905-929。[36] R. Basselier和G. Minne。“COVID-19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家庭储蓄：来自调查的启示。”《经济评论》iii（2021年）：60-78。[37] 葡萄牙银行。《经济公报》。（2021年3月）。[38] 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product/view/NASQ_10_KI（2023年），